

高級
中學

語文課本

第二冊

高級中學語文課本 第三冊

編者：周祖謨 游國恩 楊 昉
趙西陸 劉禹昌 魏建功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重慶廠
重慶李子壩220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1—10,000 1950年9

國產紙本 1950年11

定價2,750元 1951年2

意表

編輯大意

高中語文科的教學目標和作業項目，除了在程度上提高以外，大致跟初中一樣，在這裏不必再加說明。可是，爲了程度的提高，在教材的編選上有跟初中不同的地方，得在這兒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選的教材，不像初中語文課本那樣，只選單篇文章；除了單篇文章之外，從第三冊起，還選了整部著作的一章一節以及中篇小說和長篇的報告之類。希望靠這套課本來引導學生閱讀其他的東西，養成廣泛的讀書興趣和敏捷而有效的讀書能力。

第二，從第三冊起選了若干篇文言。選文言的主要目的，在使學生明確地了解文言跟現代口語的同異，養成閱讀文言參考書的初步能力。文言只是給學生閱讀，絕對不是教學生模仿着來寫作，那是不必詳細說明的。

課文的後面本來應該附上註解，提出討論提綱和練習問題的；因爲這一部分的工作還沒有完成，趕着要印出書來供各學校用，就只好暫缺，等將來再補了。

爲了進行教學的便利，我們還預備編一套「參考書」供教師們參考。現在不但參考書沒有編成，連課文後面的註解等等都來不及附上。只有希望教師們多費些指導工夫：

在課內怎麼樣展開討論、研究，來達到更深刻的了解，做到更精密的分析；在課外怎麼樣自習，來抓住課文內容和形式的要點。我們還希望教師們選定一些好讀物給學生在課外閱讀，使他們養成讀書的好習慣。至於文言的教學，我們希望教師們能够在比較文言跟口語的異同方面多多指點，多多提示。關於這一層，不在這裏詳細說，願意推薦呂叔湘先生的開明文言讀本導言，供教師們參考。

這套課本是本局特別約請周祖謨、游國恩、楊晦、趙西陸、劉禹昌、魏建功六位先生編輯的。編輯的過程中我們也提供了一些意見。關於教材選擇方面，承北京市的許多位中學國文教師提供了寶貴的意見。我們相信要編出一套完美的語文課本來，必須經過多次的修改，訂正，補充，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我們除了對幫助我們的諸位教師表示感謝外，還希望教師們在實際教學的時候，發現了不合適的地方，就給我們隨時提意見，讓我們依據這些意見加以修訂。

這一套課本選用了現代的許多著作和譯作，對於著者和譯者特地在這裏表示敬意和謝意。有些課文還略經修改，尤其要請著者和譯者原諒。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 一九五零年七月

高級中學語文課本第三冊目錄

一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一
二	爲了忘卻的記念	〔魯迅〕	一〇
三	蘇聯人民底光榮女兒	〔加里寧原作〕	三三
四	蘇聯人	〔丁玲〕	二六
五	睡冰	〔孔厥 袁靜〕	二五
六	下鄉和寫作	〔孔厥〕	四四
七	英雄的十月	〔華山〕	五五
八	海上風暴	〔矯韻純〕	六五
九	卓越的戰鬥鍛鍊	〔別克作 愚卿譯〕	六六
一〇	反攻之前	〔西蒙諾夫作 蒼木 繼純合譯〕	六六
一一	走向一條路	〔藍光〕	一〇三
一二	生辰綱		一四四
一三	林沖與魯智深		一五五

一四	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茅盾〕	一四
一五	韓非子寓言三則	一五
一六	列子寓言二則	一六
一七	王旦	一七
一八	鄒忌諷齊王納諫	一八
一九	新製布裘〔白居易〕	一九
二〇	木蘭辭	二〇

一 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

（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

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前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二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着重研究的系統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認真的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昨天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革命經驗，說到學習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學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與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現狀與中國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列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

「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國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的方法則是直接違反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與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的這條原則，於是他們自己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幹部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

軍事的特點，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到鄜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暗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極壞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的多，害人相當的大，不可等閑視之的。

三

爲了反覆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它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系，不是爲着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

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裏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人却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防防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沒有科學態度或沒有完全的科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首對子，是替這繩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抵淺；

山間竹筭，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於向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記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实實的學問，任何一點僥倖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罷！

第二種：馬列主義的態度，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而且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今天，還要懂得昨天與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要使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爲着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與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根「矢」，不是爲了別的，是專門爲了要射中國革命

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否則這「矢」就不過是一個徒供玩好的古董，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熱情，不憑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實中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排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衆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馬列主義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柢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

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爲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三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廢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研究。

(三) 對於在職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爲中心，由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爲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爲輔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

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走過許多錯路，但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改造，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選自毛澤東選集）

二 爲了忘卻的記念〔魯迅〕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爲了別的，只因爲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藉此算是鍊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裏，有一篇林莽先生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裏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麼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麼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罵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當時僅看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麼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麼一個怪名字（怎麼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麼怪，羅曼羅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裏，我照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衆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